

冷战后日本“北方领土”政策： 演变、特征及影响

陈梦莉

摘要:冷战后,日本逐渐采取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北方领土”政策。在两次领土政策强硬时期,日本政府都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试图利用自身经济优势迫使俄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在两次领土政策缓和时期,日本政府试图利用首脑外交和经济手段,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其中,外部环境和国内领土争论是日本采取不同于冷战时期“北方领土”政策的重要原因。此外,不同领土政策对解决领土问题和处理日俄双边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何把握日本政府制定“北方领土”政策的规律和特点,对于预测日本政府未来的领土政策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北方领土” 强硬 缓和 日俄关系 战后外交总决算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博士后

责任编辑:乌兰图雅

DOI:10.19498/j.cnki.dbyxk.2020.01.014

二战时期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战后“北方领土”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日俄对其存在不同解释,双方围绕是否存在争议领土、争议领土的范围以及返还条件存在争议,是领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一、冷战后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的演变

冷战后,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北方领土”政策。其

中,强硬“北方领土”政策强调对领土问题的绝对主权,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试图利用自身经济优势迫使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主张“一揽子返还”领土问题。缓和“北方领土”政策表现为可以就领土主权进行商讨或暂时搁置,坚持“政经可分”的原则先行发展双边经济合作,主张分阶段返还四岛。

(一)第一轮从强硬到缓和时期的领土政策(1991—2001年)

从宫泽喜一到村山富市时期(1991年10月—1995年12月)实行强硬领土政策。冷战时期由于受制于美苏冷战环境,日苏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双边关系长期陷入僵局。冷战后,由于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面临困境,俄罗斯急需日本的经济援助改善国内困境,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立场出现松动。1991年3月21日,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提出了返还日本“北方领土”的“库纳泽提案”,规定签订和平条约后俄向日归还色丹、齿舞两岛,然后双方就国后岛和择捉岛继续进行交涉^①。但是,面对国际新形势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日本仍然将“北方领土”问题作为发展日俄关系的前提,并试图将领土问题国际化。日本以对俄经济援助为砝码,试图借用西方国家力量迫使俄罗斯让步。1992年9月,叶利钦总统于预订出访日期的前4天突然宣布,推迟访日计划,并把韩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以国家元首身份出访韩国。随着俄罗斯与中韩的接近,日本被迫做出逐步缓和“政经不可分”的立场,决定对俄采取“扩大均衡”政策,与俄罗斯联合开发堪察加、纳霍德卡和萨哈林三个自由贸易区,并向其许诺尽早落实经济援助。虽然日本政府提出了“扩大均衡”的领土政策,但实际上仍然将领土问题和经济合作相挂钩,俄罗斯也无意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扩大均衡”政策进入死胡同。

从桥本龙太郎到森喜朗时期(1996年1月—2001年4月)实行缓和领土政策。桥本龙太郎上台后,日本“北方领土”政策发生明显变化,俄罗斯也放弃了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平衡东西方关系的“双

^① [日] 本田良一:『日口現場史 北方領土—終わらない戦後』、北海道新聞社 2013 年版、第 451 頁。

头鹰”政策,日俄关系渐趋缓和。日俄两国通过举行一系列首脑会谈,加强双边互信,双方在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出现了明显改善。1996年12月,俄罗斯为打开对日外交,任命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外长帕诺夫担任驻日大使,帕诺夫提出与日本建立“最大限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全新伙伴关系”的对日政策的构想,并解释了在“北方领土”问题政策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设想。桥本龙太郎放弃了“扩大均衡”政策,决定实施“多层次接触”政策,并继续增强首脑间、部长间的政治对话。随着桥本首相对俄关系“三原则”和“多层次接触”政策的出台,日俄双方逐渐加强经济合作。但是,自桥本首相下台后,凭借着首脑间个人信赖关系推动的双边关系失去了发展和延续的前提。随着叶利钦本人健康的恶化,小渊试图以首脑信赖关系推动解决领土争端的愿望最终破灭,俄罗斯政府正式拒绝“川奈—桥本提议”。

(二)第二轮从强硬到缓和时期的领土政策(2001—2019年)

从小泉纯一郎到野田佳彦时期(2001年4月—2012年12月)实行强硬领土政策。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开始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力图全面深化与日本的关系。普京承认日俄两国间存在领土问题,并表示不能片面急于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应该把领土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框架下考虑^①。但是,“铃木事件”^②后日俄关系发生严重倒退,日本政府在“北方领土”问题上重回“政经不可分”立场。小泉首相下台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不管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在执政时期都采取了强硬的领土政策。当民主党在野时,尽管一直批判自民党的外交政策,但2009年执政后,基本上延续了自民党的对俄政策。虽然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提出了短暂的对俄缓和政策,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将俄罗斯视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

① Joseph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Routledg, 2008, p100.

② 2002年初,日本媒体曝光前自民党立法委员铃木宗男的一系列丑闻,干涉援俄工程“日俄友好之家”招标、接受北海道岛田建设公司贿赂、还涉嫌伪造报告私藏政治捐款和发表过“归还与否无所谓”等言论,对小泉内阁在“北方领土”问题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日俄双方高层往来中断,双方关系陷入低谷。

明确提出在其任期内力求解决双方争议领土问题。但鸠山政权之后的民主党政权又重新回归传统的对俄政策,日俄关系陷入僵局。2010年11月和2011年7月,梅德韦杰夫两度登上国后岛,宣示俄罗斯对“北方领土”的主权,日俄关系迅速恶化。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实行缓和领土政策。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放弃了以前在领土问题上要求经济合作与领土问题挂钩的“扩大均衡”模式,试图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以软化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安倍“以经济合作撬动领土争端”的“新思维”实际上秉承了桥本龙太郎时期的对俄多层次外交方针,试图通过首脑和经济外交在领土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面对安倍在领土问题上的“新思维”,普京一再强调开展经济合作与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无关,坚持强硬的领土政策。2018年9月,安倍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口号,试图在其任期内使日本摆脱历史包袱,结束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和清算,使其外交“正常化”。“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北方领土”问题。因此,改善日俄关系,签订日俄和平条约成为安倍外交的重要课题。“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实质是安倍想带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试图把与俄领土谈判作为战后总决算的政治遗产。但俄外长拉夫罗夫对此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承认包括南千岛主权属于俄罗斯的二战结果,和平条约谈判将难以有进展”^①,并宣称“日方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结果和俄罗斯对争议领土的主权。安倍则使出新花样染指北方四岛,2020年开始正式把北方四岛当作日本的固有领土写进小学教科书里,这使日俄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再次陷入白热化。

二、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的特征

冷战后,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经历了由强硬到缓和,再由强硬到缓和的发展历程,通过归纳不同时期相同或相似领土政策的内容,可以更

^① 「北方领土巡り外相会談」、『毎日新聞』2019年1月15日。

明晰的把握领土政策的规律和特点。日本采取强硬领土政策把解决领土问题和发展经济合作相挂钩,强调“政经不可分”原则。而缓和领土政策主要依靠日俄首脑自上而下的推动,并且试图利用经济手段促进解决领土问题。

(一) 强硬领土政策时期的特征

纵观冷战后两个时期的强硬领土政策,日本政府都试图在俄罗斯对其经济需求强烈时利用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使俄罗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让步。同时,不管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还是其他政党上台,基本上都延续自民党时期强硬的领土政策,即使中间发生政党轮替也很难对领土政策带来实质性影响。

第一,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冷战后,虽然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相应的调整了自身领土政策,但实际上仍然将“北方领土”问题作为发展日俄双边关系的前提。不管是“扩大均衡”政策,还是“分阶段返还”政策,日本政府都是以俄承认日本对四岛主权归属为前提,并以此作为与俄开展经济合作和提供援助的条件。进入21世纪后,“铃木事件”的爆发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领土问题上继续坚持强硬的“政经不可分”原则。^①在日本国内形成的主张强硬领土政策的舆论压力,使原先小泉首相试图利用首脑外交解决领土问题的政策宣告失败。虽然随后小泉首相推出“日俄行动计划”,试图构建双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话机制,但实际上仍坚持强硬的领土政策,这使双边关系发生大幅度倒退。民主党执政后,虽然鸠山首相提出了较为缓和的方案,但在其下台后民主党野田政权重新回归自民党时期的“政经不可分”原则。

第二,政党轮替后领土政策变化不大。自民党除了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短暂下野外,一直凭借其在国会的多数席位而长期执政。2009年9月开始,民主党在三年执政期间,其外交政策相较于自民党时期的政策,并未出现大的调整,反而重新回到自民党时期的旧轨道。再

^① [日] 本田良一:『日口現場史 北方領土—終わらない戦後』、北海道新聞社2013年版、第573頁。

回顾 1993 年八党派联合政权后的外交政策,也基本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基本延续了自民党时期的强硬政策^①。面对东北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对于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来说,其采取的外交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只能是自民党政府的继承和延续,不会因新政党上台执政而发生战略性“急变”,在“北方领土”政策上也只是根据新形势变化作出的政策对应,多属于“策略”层面。因此,可以预测未来不论哪个政党上台,对日本“北方领土”政策都很难带来实质性影响。

(二)缓和领土政策时期的特征

纵观两次缓和时期的日本“北方领土”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俄首脑自上而下的推动。日俄两国稳定的政权是解决领土问题的重要条件,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试图利用首脑外交和经济手段解决领土问题,但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并未最终扩展到领土问题。与日本政府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两次日俄缓和时期,俄罗斯在日俄双边关系和领土问题上的看法发生明显变化,态度渐趋强硬,越来越显示出对日实用主义的清晰轮廓。

第一,日俄两国首脑自上而下的推动。桥本龙太郎时期和安倍执政时期,日俄双方政权稳定,通过日俄两国首脑私人关系的推动,双方领导人建立起个人关系,并保持密切政治联系,迎来了冷战后双边关系的缓和。桥本龙太郎时期,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依领导人的个人魄力解决领土问题,双方政府一直保持高层互动。日俄成功举办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会谈和川奈会谈,通过这两次“不系领带会谈”,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这也是日本政府为解决领土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到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日俄两国通过开展首脑外交迎来了第二次缓和时期。2013 年 4 月,安倍晋三首相访问俄罗斯,成为十年间日本首位访

^① [日] 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日口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5 年版、第 552 頁。

问俄罗斯的首相^①。除不断加强首脑间对话外,日本政府还定期举行外长和部长级会谈,以加强双方在经贸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并谋求在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广泛全面的交流。

第二,试图利用经济手段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开展经济外交成为日本谋取政治地位、日俄领土谈判的重要手段^②。冷战后两次日俄缓和时期,日本政府都试图通过与俄开展能源、经济合作,以加深双边互信,从而进一步促成领土谈判。日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尤其俄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开发需要日本大量资金援助,冷战后,日本一直试图利用经济优势迫使俄罗斯作出领土让步,在俄罗斯对其经济需求强烈时,这种经济手段表现出可能会奏效的表象。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对日本的经济需求逐渐下降,此时日本政府很难找到其他与俄罗斯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前,俄罗斯实际占领“北方领土”,在日俄领土交涉中大多占据主导地位,不会因日本的经济援助而被迫作出让步和改变,基本按自身本国意愿制定相关的领土政策^③。虽然日本利用经济手段使日俄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要想利用这种手段解决领土问题,事实证明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日本由强硬到缓和领土政策变化的原因

外部因素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日本对外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会根据国家利益综合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因素制定对外政策。政治精英根据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决定其政治行动,对外部环境敏感度不同的领导人会作出不同的对外政策。日本政界、学界和民众对“北方领土”问题存在分歧,这对领土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当国内主张强硬领土政策的政客占主导地位时,日本政府会采取强硬的领土政策。当国内

① 「第183回国会参议院予算委员会会議録第18号」、平成25年5月15日、第24頁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koho/183/keika/ke2700027.html>。

② 沈海涛、张玉国等:《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③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16.

主张缓和领土政策的政客占主导地位时,日本政府则会采取缓和的领土政策,但受多数主张强硬领土政策的学者和民众影响,即便采取缓和的领土政策,日本政府也不敢轻易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和让步,只能采取有限的缓和政策。外部环境和国内领土争论是日本由强硬到缓和领土政策变化的重要原因。

(一)外部因素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使日俄关系逐渐升温,使日本逐渐放弃了在领土问题上长期推行的“政经不可分”原则,试图谋求在领土问题、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交流等各个层次加强双边全面合作关系。冷战后,日苏关系转变为日俄关系,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将恢复全球大国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急需日本的经济援助与合作以改善国内经济困境。对俄罗斯而言,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有利于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化日美同盟。因此,俄罗斯积极改善同亚洲国家的关系,逐渐将日本视为“潜在的同盟国和伙伴”,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和双边贸易合作。而日本也逐渐改变以苏联威胁为战略目标的外交政策,改善对俄关系成为其实现“欧亚大陆外交构想”的关键,两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层面形成优势互补,也迎来了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第一轮从强硬到缓和领土政策的转变。

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在日俄双边关系向日本发出的积极信号,重燃日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希望。安倍首相在确信彼此能够长期执政后,认为普京政治强人下的稳定政权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机会。日俄双方领导人出于各自战略需要都有意在他们任期内改善双边关系,这使日俄关系迅速升温。普京表示愿意推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谈判的倡议,建立促进日俄间经济和安全等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与日本在开发远东地区的合作,提出以“平局”解决“北方领土”问题^①。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俄罗斯,俄罗斯遭受了经济制裁、原油价格下

^① 「北方領土問題は引き分けで」、『毎日新聞』2012年3月1日。

跌、卢布贬值的“三重苦”。因此,俄罗斯为摆脱外交孤立困境,把日本作为瓦解西方制裁的突破口,发展对日关系以获得日本对其投资和贷款。2013年11月,日俄首次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会谈,普京发表声明表示,“双方要致力于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发展两国关系”,即提出所谓的“政经分离论”。俄罗斯主张通过扩大和推进双方经济合作关系,寻找解决领土问题的对策,意在利用日本经济科技优势加强远东开发。在此背景下,安倍积极促成普京访日,并提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思维”,领土政策更趋灵活,迎来了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第二轮从强硬到缓和领土政策的转变。

(二)日本国内争论的影响

日本国内围绕“北方领土”问题的争论是影响政府制定领土政策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在日本政界围绕“北方领土”问题出现了不同的领土政策和主张。同时,国内民众和学界也是影响日本“北方领土”政策的重要内因,其中坚持强硬领土政策的民众和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政界的争论是影响日本政府从强硬到缓和领土政策的重要因素。冷战时期,激进派政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日本政府长期采取对抗性和消耗战略,领土问题一直陷入僵局^①。冷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主张采取缓和领土政策的温和派政客,使日俄关系缓和,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了更多条件。政界分歧对日本政府缓和和强硬政策交替出现的领土政策有重要影响。冷战期间,日本政界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激进保守派占主导地位,直接影响日本政府“北方领土”政策。冷战后,以桥本龙太郎、森喜朗为代表的日本首相执政时期,采取了缓和日俄关系的领土政策。但在此之后,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2012年12月,安倍二次执政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领土政策,温和派占主导地位,影响安倍政权的领土政策。

其次,冷战后,国际环境和研究议题的转变使日本学者不再只狭隘

^① [日] 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へる』、岩波書店1990年版、第221頁。

地关注领土和安全问题,而是基于国际环境中增加的新因素和国内现实因素,主张试图通过日俄间经济、科技、文化等低级政治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领土等领域的高级政治合作,由被动的领土对抗政策转向积极的经济合作政策。冷战对峙的结束为领土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在“北方领土”问题研究上出现了许多新动态和新进展,出现了更多呼吁灵活处理争议领土,发展与俄经济关系的声音,与坚持“政经不可分”和返还四岛政策的激进派学者形成争论^①。学界对领土问题的看法和争论,能够为日本政府制定领土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并能引导对日本民众的领土看法,产生舆论影响,这也是日本领土政策呈曲线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从国内政治过程来看,除官僚、政党和首相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国内民众也是日本外交决策的重要内因。北海道岛民和全国国民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看法有所不同,全国国民强调主权和民族尊重,主张返还四岛,而北海道岛民出于现实利益支持先返还二岛的领土政策。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在很多事务上,由地方政府处理,中央政府无权干涉,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等各级地方行政组织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行政组织。因此,“北方领土”问题涉及北海道的地方实际利益,中央政府必须考虑北海道地方政府和全国国民的意愿。

四、日本领土政策的影响

虽然“强硬”和“缓和”两种领土政策都没有成功解决日俄领土争端,但产生了大为不同的成效。总的来看,强硬的领土政策使日俄领土争端陷入僵局,错失解决领土问题的最佳时机;而缓和的领土政策使双边关系有所发展,使日本认为这为领土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可能性。当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未来能否在领土问题上有所突破,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放弃强硬的领土政策,积极改善双边关系,才能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

^① 陈梦莉、张强:《日本国内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5期。

好的环境。

(一) 强硬领土政策的影响

日本认为,冷战后实际上曾出现过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日本强硬的领土政策使其错过解决领土问题的机会。俄总统叶利钦和普京执政初期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最佳时机,两者都曾提出过“返还二岛”的提议。在苏联解体前,叶利钦就对日本表现出了很大的主动性^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北方领土”,但国内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困境,急需日本的援助和经贸合作,这也成为日本视为收回“北方领土”的契机。对于将争议岛屿返还日本,叶利钦总统并未提出特别反对意见,只是要求双方必须签订新的和平条约并给予俄罗斯补偿^②。但日本政府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摇摆状态,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日俄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上处处牵制和阻挠,日本最终遵循了原来处理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政经不可分”原则,要求先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后再发展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关系^③。

普京执政初期,在对外政策上采用协调东西方关系的外交政策,重视亚太地区,积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普京基本上继承了叶利钦的路线,承认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有效性,在领土问题上试图寻找日俄双方都能相互妥协的解决方案。但是,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坚持“一揽子返还四岛”的强硬领土政策,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当前,日俄虽然达成了以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意愿,但普京坚持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结果,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

(二) 缓和领土政策的影响

首先,日本的缓和领土政策有利于增强政治互信,在客观上有助于

① [日] 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日ロ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5 年版、第 547 頁。

② [日] 木村汎:『日露国境交渉史 北方領土返還への道』、角川書店 1993 年版、第 225 頁。

③ [日] 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日ロ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5 年版、第 527 頁。

推动改善日俄关系。历史上日俄多次因领土问题引发战争和冲突,造成对彼此的“负历史记忆”,使彼此之间相互不信任和充满敌意。从历史上看,日俄关系错综复杂,长期政治对立严重,缺乏互信^①。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采取缓和的领土政策后,双边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在二百多年的日俄关系史中两国第一次认为对方不是自身直接的安全威胁,两国决策者已经基本消除了这种相互充满敌意的看法。此外,日本政府采取的缓和领土政策,有利加强日俄两国民众间相互交流。安倍二次执政后,日俄两国间交流和合作有了很大提升。两国高层密切往来,合作交流日趋机制化,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对话机制。

其次,日本的缓和领土政策可能有利于日俄两国缔结和约。随着国际形势和经济的发展,领土问题已不再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唯一内容,日俄两国越来越追求经济的互补性。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俄首脑多次举行会谈,不再片面强调争议领土的重要性,采取缓和的领土政策,就缔结和平条约问题取得政治共识,俄罗斯政府提出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要先于其他所有问题,这意味着两国可能先缔结和平条约后处理争议领土。

最后,纵观日本政府的缓和领土政策,不管是“多层次接触”还是“新思维”政策,都没能使日方领土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每次缓和领土政策都给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带来了新思路,尤其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实施缓和领土政策后,在日本国内形成了越来越多主张缓和政策的“温和派”,认为这有利于日俄在缔结和平条约和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

^① 根据判定对方言行有利或有害于己方利益,我们可将两国间互信界定为“积极互信”和“消极互信”。

“Bid Rigging”: A Special Behavior Pattern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HU Liang

Abstract: “Bid Rigging” is an unwritten rule in the Japanese economic sphere, referred to a group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bidding at the time of invitation to bid, which shall negotiate internally the winning enterprise or the reserve price of the bid. Under a democratic system, although there is some restriction against the hidden law, bid rigging, as a special behavior pattern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still have a hidden influence. The emphasis on coordination reflected in the bid rigging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bid rigging”; hidden law; behavior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Japan’s “Northern Territory”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CHEN Mengli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due to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Japan had adhered to a tough “northern territory” policy, and Japan-Russia relations had reached a deadlock.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apan has gradually adopted a policy of “northern territor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during the Cold War. During the two periods of tough territory polic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inseparabili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tried to use its economic advantages to force Russia to make concessions on territorial issues. During the two periods of easing territory polic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use the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means of the summit to promote the settlement of the territorial issue. Among the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Japan to adopt different polici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during the Cold War. In addition, different territorial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esolving territorial issues and dealing with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To understand the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formulation of “northern territor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dicting the future territorial polici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Keywords: “Northern Territory”; hardline policy; relaxation; Japan-Russia relations; post-war diplomatic final account